臺灣師大歷史學報　第29期　頁133-170
民國九十年六月

一九三〇年代馬克斯主義論者對中國經濟恐慌的觀察(1930～1935)

李宇平*

提　要

一九三〇年代中國的馬克斯主義論者並不認爲經濟危機是景氣循環固定的週期性現象，或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運行不可或缺的動態要素。相反的，他們認爲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即將衰頹或終將崩潰瓦解的徵兆。他們認識到了在經濟危機擴展的過程中，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工業危機不只是與各農業國家的農業危機同發生，而且與之錯綜結合在一起。他們並且發現，這次危機不僅是在生產範圍和商業範圍洶湧流行起來，同時蔓延於信貸和金融範圍，終至完全推翻了各國間原有的信貸關係和金融關係。以這樣的認識爲基礎，中國的馬克斯主義論者呈現的中國經濟恐慌史，性質近乎是一個普遍歷史過程的表現，卻較少表現中國歷史發展過程的複雜性與獨特性。他們進一步論述說，危機在經濟領域內普遍化傾向的增強，顯示中國一如其他部分的世界經濟，已然進入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即「帝國主義」或「資本帝國主義」時代。中國的馬克斯主義論者，意識到它具有如下的特徵(1)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已經融合一起，在“金融資本”的基礎上形成了金融寡頭，從而威脅了中國的經濟秩序；(2)與商品輸出不同的資本輸出有了特別重要的意義。這可以說明貨幣金融方面的救濟手段，何以一如世界其他各國的馬克斯主義論者，同時也特別受到三〇年代中國馬克斯主義論者的注意。

---

* 本文作者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 作者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惠賜寶貴意見，特此申謝。

Shanin以爲有關馬克斯主義的研究法可分兩種型態，一是階級分析法，一是體系分析法。或許因爲有關中國經濟恐慌觀察的現象是個可以探究的具體而動態的個案，而不是純粹中國社會性質的靜態反映，馬克斯主義論者有關中國經濟恐慌的觀察，除了慣有的階級分析之外，略帶若干體系分析色彩。儘管三〇年代中國的馬克斯主義論者相信列寧所謂「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的名言，然而他們顯然明白，帝國主義絕不如列寧所言，只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階段，它也是兩個以上的國家或經濟體系之間的關係。資本主義的特徵—社會矛盾—因此也是國際性的。換言之，這種矛盾並不是一國之內階級與階級之間的矛盾與對立，它也發生在世界上的帝國主義國家與（半）殖民地國家之間。因爲他們認爲「殖民地係內含於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之中而爲資產階級的一個特殊的壓榨對象」。儘管階級的關係常被國家或民族的關係所隱蔽，然而（半）殖民地與資產主義國家相對立所構成的剝削關係，實際上也延伸至國內，使中國這樣的半殖民地的無產階級化有更廣泛和深化的發展。固然，殖民分析補充了低度發展國家內階級結構中不清晰的面向，然而正是這種階級結構爲核心的分析，使資本主義體系成爲展現雙重歷史發展過程的複雜結合的分析體系。此雙重體系，其一是發生在國際關係層次上，其一是發生在國家社會之內。資本主義分析體系因此是包含綜合「外部因素」與「內部因素」的分析體系。中國馬克斯主義論者有關中國經濟恐慌的分析取徑，似乎展現了體系分析的特質。

關鍵字：馬克斯主義　一九三〇年代　世界經濟大恐慌　中國經濟恐慌　金融資本

一、前　言

一九三〇年代的中國經濟蕭條，一般以爲原因有四。分別是世界主要國家貶低外匯價值，1934 年美國的購銀法案，日本佔領東北，以及 1931 年長江大水。在世界經濟恐慌的高潮中，1931 年至 1933 年英、日、美相繼貶低幣值，1934 年美國實施購銀法案，皆造成世界白銀價值的飛騰，以及中國外匯價格的上揚。因爲這些國家對華貿易總額佔中國對外貿易額的 70%，加以在國外銀價上漲之際，國內白銀大量外流，於是導致國內經濟產生嚴重問題。此外，東北淪陷，對中國經濟也是個沈重的打擊。由於東北是全國唯一有大量出超的地區，加以東北也是中國本部各地消費工業產品的大市場。1931 年日軍強佔東北，不但加深中國的國際收支問題，而且使國內消費工業失去了一個迅速擴張的良好市場。最後，1931 年的長江大水，爲數十年僅見，受害地區包括江蘇、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中國精華區。此次水災造成一千四百萬災民，數萬人頓失數億元的購買力，其對於經濟各部門的打擊，可想而知。就是在上述各項原因衝擊下，中國經濟陷入蕭條的深淵，各業凋零，幾有不可終日之勢。[1]

儘管一九三〇年代中國的經濟危機未必與當時歐美等核心工業國家的經濟恐慌同其規模，然而三〇年代中國言論界卻普遍認知到中國經濟已陷入恐慌蕭條的困境。頗多專家學者以「恐慌」爲題，撰書著文，說明中國經濟危機已如排山倒海而來，呼籲朝野上下注意中國經濟情勢的險峻發展。這些以「恐慌」爲題的著述共同的認爲 1931 年在中國爆發的經濟危機，[2] 是建立於工農手工業經濟在國內政局不安、苛捐雜稅盤剝、災荒肆虐、政經不易發展等國內因素長期累積，以及上述世界經濟恐慌、銀價上漲等西方經濟勢力深入內地，在全國範圍內達到最

---

1 王業鍵，《中國近代貨幣與銀行的演進，1644 ～ 1937》（台北：中研院經濟研究所，1981），頁 53-55。

2 一般以爲中國經濟恐慌在 1935 年法幣政策頒佈後有趨於和緩之勢，見久保亨，〈貨幣改革以降の中國經濟〉，野澤豐編，《中國の幣制改革と國際關係》（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1），所以本文的論述亦以 1935 年爲限。

高階段的時候。[3] 所以恐慌雖經延續了數個年頭，但普遍發生到各經濟部門的恐慌，說明了中國經濟恐慌的擴大，雖係由於帝國主義及世界經濟恐慌等國外因素之衝擊透過城市而波及內地，然發於國內的因素，卻也使內地遭受恐慌的危機較之城市，尤其上海來得早且嚴重。[4]

在上述有關中國經濟恐慌現象認知的基礎上，中國馬克斯主義論者對此一現象的分析與詮釋，一如二、三〇年代當時學術界掀起的數次有重大歷史意義的論戰一般，表現了一種對科學社會觀理解社會問題、研究社會結構的方法論的認同。自 1927 ～ 1937 年間無論是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中國社會史論戰和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參戰者都希望能使中國歷史和社會發展符合社會的辯證發展規律，從而制定出一套解釋中國歷史的方法論。他們試圖說明中國社會“現階段”的本質和與社會發展的基本理論有不可分割的關係。[5] 社會結構在特定歷史階段有其必然的發展類型，人與人之間互相關係的變化和矛盾亦將導致社會按階段循序漸進。由此形成之種純粹的直線的進步史觀，成爲馬克斯主義論者實踐社會改革的依據。他們相信人類社會可以根據預定的規則來分析，所有革命活動的成敗皆爲社會變化的表徵。人類社會既被認爲應由封建社會逐步邁向資本主義社會，所以如果一個社會的封建因素依然存在，就是因爲一場革命未能把社會轉變

3　1931 年至 1935 年之間以「恐慌」爲題的著述甚多，如路易士著、張履鸞譯，〈中國之經濟恐慌〉，《銀行週報》，卷 19 期 41（1935 年）；田中忠夫著，張漢譯，〈中國經濟的危機〉，《中國經濟》，卷 2 期 6（1934 年 6 月）；鄧飛黃，〈中國經濟的衰落程度及其前途〉，《中國經濟》，卷 1 期 3（1933 年 6 月 15 日）；許達生，〈中國金融恐慌之開展〉，《東方雜誌》，卷 32 號 5（1935 年 3 月）；莫湮，〈上海金融恐慌的回顧與前瞻〉，《東方雜誌》，卷 33 號 22（1936 年 11 月 16 日）；吳大業，〈中國經濟衰落中之中國〉，《中國經濟研究》（上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8 年）；錢俊瑞，〈中國目下的農業恐慌〉，《錢俊瑞選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年）；楊伊默，〈中國農業恐慌的特殊性〉，《中國經濟恐慌與經濟改造》（上海：中華書局，1935）；李紫翔，〈中國經濟恐慌之觀察〉，《中國經濟恐慌與經濟改造》（上海：中華書局，1935）；錢亦石，〈世界經濟危機與中國經濟危機〉，《新中華雜誌》，卷 3 號 13（1935 年 7 月）；谷春帆，〈金融恐慌的原因與救濟辦法提要〉，《社會經濟月報》，卷 2 期 6（1935 年 6 月）；谷春帆，〈物價與恐慌〉，《社會經濟月報》，卷 2 期 9（1935 年 9 月）；顧季高，〈中國當前之金融危機〉，《銀行週報》，卷 17 號 10（1933 年 3 月）等等。

4　李紫翔，〈中國經濟恐慌之觀察〉，《中國經濟恐慌與經濟改造》（上海：中華書局，1935），頁 13-14。

5　D.W.Y. Kwok,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Chapter 7, pp.162-170.

爲資本主義社會。此其所以主流派馬克斯主義論者把當時的社會發展階段視爲半封建半殖民社會，並且認爲中國必須進行反帝國主義及其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暨土地革命。馬克斯主義論者證明了革命行動的必然性，[6] 正是因爲他們視歷史決定論爲歷史演變之通則。

馬克斯主義論者闡明社會變遷的動力法則的另一特徵，在於他們全部指向於對階級支配與剝削的各種分析。經濟被他們認爲是社會特性和社會運動的決定因素。他們認爲生產活動的方式形成陶鑄社會關係的根本，且制約著人類社會基本的結構變遷。每一生產體系中必然有一套與生產有關之個人之間明確的社會關係，爲人們生活中行動之原動力之所自。個人藉著以生產爲手段可以產生的個人財產之擁有的關係，那些積聚著生產手段，從而也積聚著以生產成果擁有形式而表現其所得的人，強行剝奪大多數生產者所生產的成果，因而把社會分成剝削者與被剝削者。馬克斯主義論者從而認爲兩造之間所形成的階級利益是對抗的。衝突取代了共同合作的目的。這個社會所有的制度演變，利益分配之趨勢因而全取決於各階級彼此對抗的形勢。[7] 正是根據不變的物質經濟力量可以發現支配社會發展之規律，以及社會發展之規律與物質運動規律一致的觀點，使馬克斯主義論者的社會發展史觀具現爲一可以獨立於人類意志控制之外的客觀歷史過程。

中國馬克斯主義論者多從可以表現普遍性整體的具體現象（如經濟力量）著手，以掌握歷史發展之本質，因而會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之下，爲中國經濟之愈趨貧窮化以及革命的迫切性，提供解釋性理論。1927 至 1937 年間的數次論戰，即是明證。三〇年代中國發生的經濟恐慌則是當時實在發生的個別歷史事件，與前此中國馬克斯主義論者一般論述分析的對象不同。由於馬克斯主義論者期盼確認

---

6 Arif Dirlik, *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Chapter 3 & 7 ; D.W.Y. Kwok,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Chapter 7 ；韓明漢，《中國社會學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Chapter 6.

7 此一論點引自陳翰笙《解放前的土地與農民——華南農村危機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 年 8 月），頁 43。馬若孟推崇陳翰笙以馬克斯主義史學研究中國農村經濟，自成一家之言，具有經典性的地位，爲馬克斯主義史學主流派的代表人物。Myers, Ramon H., *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 1890-1949*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15.

中國歷史發展之歸趨，具世界普遍性的意義，[8] 馬克斯主義論者對於約與世界同時發生的中國經濟危機的觀察，或許有助於吾人深入了解中國馬克斯主義論者史觀之特徵。本文擬於第二、三節討論馬克斯主義論者對中國經濟恐慌發生原因的觀察，其後諸節則擬討論馬克斯主義論者針對恐慌原因所提諸項救濟對策。四、五兩節係討論有關中國對外關係部分的救濟言論，六、七兩節則係討論有關國內因素的救濟對策。

二、中國對外貿易條件不平等說

馬克斯主義論者以爲經濟危機爆發時，資本主義國家與殖民地間交換的不平等有日益擴大的趨勢。錢亦石[9] 指出，1934 年《中國經濟年報》編製的五年來（1929 ～ 1934 年）中國輸出入貿易各項指數，即是帝國主義對中國「巧取豪奪」的眞憑實據。他以爲這些沈默的數字，告訴我們三件事：第一，輸入價格在 1931 年以前是上升的，1932 年以後雖是下降，但降幅不大；輸出價格，自 1931 年起，開始下降，1934 年左右更急轉直下，跌落 31% 。第二，輸入品總量連年減少，1934 年已比 1929 年減少 50% ；輸出品總量除 1932 年有一度急劇的減少外，其餘都是增加的，1934 年比 1929 年只減少 26% 。第三，輸入品總值在 1931 年以前是增加的，1932 年以後，逐漸減少，唯 1934 年只比 1929 年減少 36% ；輸出品總值只在 1931 與 1933 年間略有增加，其餘都是大大減少，1934 年比 1929 年減少已達 50% 。他以爲這一段冗長的說明，可概括爲兩件事，即「五年來，就輸入品說，總量減少的比例大，而總值減少的比例少」；就輸出品說，「恰恰相反，總量減少的比例小，而總值減少的比例大」。他以爲這些輸入與輸出價值之差，乃中國「無形的損失」，正是「半殖民地的奴隸被帝國主義『巧取豪奪』

---

8 D.W.Y. Kwok,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Chapter 7, pp.168-170.

9 錢亦石 (1889 ～ 1938)，原名城，字介磐，筆名嘯秋、史廬、谷蓀、白沙、石顛、巨濤、楚囚；湖北咸寧人，曾就讀武昌高等師範，曾任武漢中學教員參與創辦共進中學，湖北第一師範學校教員，出版過《新教育》刊物，主辦過《武漢評論》週刊，國民黨湖北省黨務幹部學校校長，上海法政學院和暨南大學教授，主編《世界知識》、《新中華》、《中華公論》雜誌、《中國的一日》叢書。見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石家莊市：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年），頁 1529 。

的一個實例」。它使人深深認識到，「自 1932 年以後，各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好轉的果實，至少有一部分是向中國開刀取得的」。[10]

王德昭也強調在世界經濟危機爆發期間，資本主義國家與殖民地間交換的不平等有日益擴大的趨勢。儘管針對原料和製成品的價格指數表的分析，[11] 顯示帝國主義和中國之間的商品交換條件，確實是對中國不利的，但王德昭認爲這並不能眞正表示在危機時期殖民地和帝國主義間交換不平等增進的程度。他引伏爾加 (E. Varga)[12]《大危機及其政治的結果》書中的一段話，指出中國此一殖民地在經濟危機中所受的特別損害。伏爾加說：「雖然這種數字是極不正確的。他們並不能正確表示出危機時期殖民地和帝國主義國家間交換不平等情況的擴大；因爲他們所代表的祇是那些爲歐洲殖民地商品經手人所接受的數字。」農民在殖民地所接受的價格，比這些下跌得更厲害。他認爲向來建築在不平等基礎之上的殖民地與帝國主義國家間的國際貿易，不能再維持平衡了，因爲殖民地所僅有的一點資金也不斷外流。[13]

---

10 錢亦石，〈世界經濟危機與中國經濟危機〉，《新中華雜誌》，卷 3 號 13（1935 年 7 月），頁 27-28。

11 原料與完製品價格指數表：

	荷屬東印度	加拿大	中　國	安　南	美　國	德　國	英　國
1929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932	35	53	83	61	70	71	86
1933	36	60	67	53	78	72	78
1934	38	65	72	60	80	75	86

見王德昭，〈世界經濟危機與殖民地經濟〉，《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卷 3 號 1（1936 年），頁 234。

12 Euqenii E. Varga, 1879-1964. 蘇聯馬克斯主義經濟學家，前蘇聯科學院世界經濟和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長。在 20 年代資本主義局部穩定時期，根據馬克斯的方法，依據對複雜現實的分析，正確地預測了 1929-1933 年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著有 *The Great Crisis and It's Political Consequences.* 見何承艱、王德樹、胡個湖主編，《馬克斯主義人物辭典》（北京：中國廣播出版社，1989 年），頁 47；又見《經濟學辭典》（台北：三民書局，1990 年），頁 587。

13 王德昭，〈世界經濟危機與殖民地經濟〉，《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卷 3 期 1，頁 234-235。

至於中國對外貿易之所以日趨不利，錢俊瑞[14]認爲原因之一是，中國經濟危機是在世界資本主義總恐慌的基礎上發展和加深起來的。[15]他以爲中國作爲列強原料根據地的作用，在世界經濟恐慌期間，顯然已大爲削弱。中國原料品減少的輸出，即可證明。然而，另一方面，國外廉價農產品卻變成中國國貨及土產的致命威脅。他並進一步指出，目前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恐慌，雖以軍需工業的發展，通貨膨脹的厲行，以及對於國內外大衆剝削的加甚，暫有好轉之象，可是各國的農業恐慌，非但沒有跟著減輕，反而日趨深刻。這種國際環境，決定了中國經濟恐慌將因糧食傾銷造成的農業恐慌而日趨深刻，絕無超度的可能。[16]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根基既已動搖，中國本身也將因陷入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漩渦中，使其本身缺乏克服經濟危機的條件。

錢亦石也強調中國此次經濟危機爆發於資本主義總危機之中。他認爲建立在資本主義總危機之上的世界經濟恐慌，就目前而論，「深刻化確已中止」。它不會走向新的繁榮期，也不會回到舊的衰落點。在某種意義上，經濟危機可說是從危機的深淵過渡到蕭條的階段。錢亦石認爲，這雖是一種好轉，「不過這種好轉是矛盾的，不規則的，並且帶人爲的性質」。因爲好轉的力量，歸功於「軍備競賽的影響，通貨膨脹的影響」。而最重要的原因則在於各國將經濟危機中的損失，「在國內轉嫁到工人與農人身上，在國外轉嫁到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廣大民衆身上」。就各國國內而言，可以見到資本主義國家內的佃農，「要生生的棄田

14　錢俊瑞 (1908～1985)，筆名陶直夫、錢澤夫、澤夫、周彬，江蘇無錫人，曾就讀江蘇省第三師範學校，無錫民眾教育學院，曾創辦《世界知識》雜誌、《永生》週刊和《現世界》、主編《江淮日報》、創辦《解放》三日刊，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黨祖書記、副部長、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主編《世界經濟概論》、《世界經濟年鑑》、《中國國防經濟建設》、《中國經濟問題講話》，著有《中國貨幣制度往那去》、《高等教育改革的關鍵》、《世界經濟學原理初探》。見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石家莊市：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1529。

15　資本主義總危機，依錢亦石的說法：「什麼是資本主義總危機呢？扼要的講，有兩個特徵：一是資本主義的體制分裂；一是固定資本的慢性剩餘。前者是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中分裂出六分之一的社會主義系統，形成兩個制度的對立，社會主義前進一步，即資本主義削弱一步。後者是戰後各國工廠的開工率不足，即在繁榮之年 (1929)，英國工業生產達到戰前的99.1，德國更少，只達到戰前的67.4，以致各國都有廢置不用的固定資本。這兩個特徵，在戰前是沒有的，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總危機在戰前是不存在的」。見所著，〈世界經濟危機與中國經濟危機〉，頁25。

16　錢俊瑞，〈中國目下的農業恐慌〉，《錢俊瑞選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111。

不種，於是顚沛流離，死亡於道路者，日有所聞」。至於向國外轉嫁，「自然是向殖民地與半殖民地開刀」，特別是在「遠東方面向中國開刀」。[17] 所以，世界經濟好轉是在「以鄰爲壑」的條件下好轉。正因如此，各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好轉的時候，中國經濟反陷入更深的危機中，無以自拔。

馬克斯主義論者因此認爲在經濟危機性質的變化上，三〇年代中國的經濟危機具有從封建經濟危機，逐步過渡到與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相交織的特點。[18] 二十世紀三〇年代以前，中國受到資本主義國家傾銷農產品的數量比較小。中國出現的危機，主要是封建性的，進入二十年代末期之後，由於世界資本主義危機頻繁爆發，各資本主義國家爲了轉嫁危機的禍害，對中國進行的剩餘農產品傾銷數量，相較於從前，就越來越大。如此，中國的經濟危機在資本帝國主義國家的轉嫁下，逐漸出現了封建性危機與資本主義性質危機相交織的局面。[19] 錢俊瑞認爲自 1931 年開始的中國經濟恐慌，在性質上已具資本主義恐慌的性質，但卻「絕不是純粹的資本主義恐慌」。因爲以「技術特別落後，生產性特別薄弱爲特徵的中國農業生產，只有在一般購買力空前的降低，地方經濟封鎖性特別濃厚的情況下，又被牽入了資本主義世界的漩渦」，亦即中國的經濟變成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一環之後，才發生了恐慌。換句話說，中國落後的經濟，「只有以世界商品構成分子的資格在世界市場上競爭的場合，才會發生恐慌 —— 資本主義恐慌的現象」。[20] 因此，誠如陳翰笙[21] 所言：「中國不但正在受封建主義之害，而

---

17 錢亦石，前引文，頁 26。

18 封建主義：以封建地主占有土地幷剝削農民或農奴剩餘勞動爲基礎的社會制度。產生於奴隸社會瓦解的基礎上。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是封建社會兩個相互對立的基本階級。地主階級占有絕大部分土地，農民或農奴完全沒有或只有很少的土地，而不得不耕種封建地主的土地，在人身上依附於封建地主。地主剝削農民的方式主要是地租。封建社會的經濟點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封建社會末期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見黃達強、黃安森、石永義主編，《簡明科學社會主義辭典》（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 年），頁 497。

19 鄭慶平、岳琛編著，《中國近代農業經濟史概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 年），頁 289-290。一九三〇年代的中國，依馬克斯主義論者的界定，屬於「半封建半殖民社會」，所謂半封建半殖民社會，即政治上經濟上受帝國主義國家控制，封建經濟逐步瓦解，資本主義因素已得到一定發展的社會。它不是一個獨立的社會經濟形態。見《經濟學辭海》（台北：東華書局，1993 年），〈政治經濟學〉，頁 9。

20 錢俊瑞，〈中國目下的農業恐慌〉，《錢俊瑞選集》，頁 107-108。

21 陳翰笙 (1897 ～)，江蘇無錫人，曾就讀美國波莫納大學，美國芝加哥大學碩士，德國柏林大學博士，曾任北京大學教授，莫斯科國際農村運動研究所研究員，中央研究院科學研究所所長，著有《工業資本與中國農民》、《華南農村危機研究》。見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石家莊市：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年），頁 1068。

且也在受資本主義之害」。[22]

正因爲中國原有的封建經濟已陷入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漩渦中，馬克斯主義論者又認爲，在危機的發展程度上，一九三〇年代中國的經濟危機經歷了一個從慢性漸行性危機，發展到急性崩潰性危機的深化過程。他們以爲一九三〇年代以前中國經歷的封建性危機是一種慢性恐慌，其後發生的資本主義危機，則表現著急性恐慌的特質。他們以爲這次的急性恐慌，雖是建立在封建性的慢性危機的基礎之上，卻是受到帝國主義在這次恐慌中的外來影響才形成的。

李紫翔的說法頗具代表性。他以爲：鴉片戰爭以後，當「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剝削達到某一較高的程度」，使「慢性的恐慌發展到某一階段」之後，若「再加一外來的影響之逼迫，每每轉爲急性的恐慌之爆發」。因此，在一九三〇年代之前，由於小商品經濟的地方性和中國工農群衆生活水準的特別低下，加以帝國主義者劃分勢力範圍，軍閥的割據地方，「中國不曾有普遍全國的大障礙」。可是一九三一年爆發的恐慌，建築於「工農手工業經濟，在帝國主義與封建的剝削之全國範圍內，達到最高階段的時候，同時又加上帝國主義者經濟恐慌損失的轉嫁」，所以，恐慌的範圍，「包括了全國農村，並且蔓延到每一個都市，每一個生產部分」。[23]正由於此次經濟恐慌是向著擴大普遍的方向發展著，在程度上也最深刻而尖銳，從而表現出急性恐慌的特質。[24]

錢亦石也指出，這一危機是發生於慢性危機基礎之上的急性恐慌。他以爲中國是帝國主義支配下的半封建國家。在此之前，封建剝削深入農村，是造成慢性經濟危機的條件。而慢性經濟危機與世界經濟危機合流之後，則爆發1931年以來「急性的全般的中國經濟危機」。他認爲封建勢力與帝國主義相依爲命，在政治上與經濟上保持割據的形勢，是「推進中國經濟走向急性而全般的經濟危機的兩個車輪」。[25]

22　陳翰笙，《解放前的地主與農民——華南農村危機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頁10-11。

23　李紫翔，〈中國經濟恐慌之觀察〉，《中國經濟恐慌與經濟改造》（上海：中華書局，1935年），頁13-14。

24　李紫翔，〈中國經濟恐慌之觀察〉，《中國經濟恐慌與經濟改造》（上海：中華書局，1935年），頁13-14、26。

25　〈世界經濟危機與中國經濟危機〉，《新中華雜誌》，卷3號13（1935年7月），頁28。

馬克斯主義論者同時強調，在危機表現的基本形態上，中國經濟危機具有生產不足危機與生產過剩危機相結合的特性。他們強調中國農業經濟中仍然存在的農業經濟型態，以及此一危機所具有濃厚的半封建特質，決定了中國將發生生產不足危機。而中國經濟已被捲入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帝國主義剩餘農產品在中國傾銷，以及此一危機所具有濃厚的半殖民性質，則決定了中國的生產過剩危機的形成。依據錢俊瑞的看法，目下中國的國民經濟危機，正配合著國際和國內的條件，從而以更深刻更全面的姿態表現出來。就國際關係而論，中國經濟正以世界資本主義一環的姿態，「表現爲過剩生產物泛濫之所」，因此形成物價狂跌，產業衰竭和農村破產的現象。就國內的條件而言，「中國半封建生產關係底沈淪，阻斷了生產力繼續增長之路，甚至使它日趨衰落」。「市場上過剩的商品」和「極度低落的生產力」，雖是互相排斥的範疇，但在中國，卻給統一起來，而成爲現階段國民經濟的兩大特徵。他以爲，這兩個特徵，「相互影響，相互促進」，而在世界經濟危機發生後，「列強資本對華統制加強」，又爲此等特徵全面展開的基本動因。[26]

陳翰笙也支持此一看法。他以爲三〇年代經濟危機發生後，一方面竟然使中國的富農，「縮減他們的耕地面積以及他們的勞動力」；另一方面，中國農民「也經不住日益增加的進口農產品的衝擊」。據此他肯定的表示，凡是研究過中國情況的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幾乎都可以發現「大量的封建殘餘」，儘管「只有極少數學者沒有忽視中國的政治經濟中那種複雜的殖民地性質」，但是這種殖民地性質實際上比其他任何因素，更加有助於加強目前封建關係的韌性，甚至強度。因爲「中國農民不但正在受封建主義之害，而且也在受資本主義之害，不但正在受中國生產不足之害，也在受國外生產過剩危機之害」。[27]

依據以上的推論，馬克斯主義論者認爲，中國內含於世界經濟體系之中而成爲帝國主義的一個特殊的壓榨對象，只是在持續中國原有封建性的基礎上，助長帝國主義侵略的惡性效果，卻不能在互惠的關係下，使資源由封建傳統的農業部門，大量流向現代產業部門，以致於造成中國的半殖民半封建並存的現象，而此

---

26 錢俊瑞，〈中國現階段土地問題〉，《錢俊瑞選集》，頁 213-214。

27 陳翰笙，《解放前的地主與農民——華南農村危機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頁 10-11。

正是中國同時遭受生產不足之害與生產過剩之害的根源。

根據上述，可以明瞭，馬克斯主義論者何以極力援引伏爾加 (E. Varga) 有關世界經濟危機爆發和發展的理論體系，[28] 解釋恐慌期間殖民地在世界經濟危機中之地位。依據王德昭的說法，這是因爲「伏爾加認爲經濟危機期間加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身上的壓榨關係，是封建的和資本主義關係的複和」。[29] 錢俊瑞又進一步說，伏爾加曾將世界各國的經濟恐慌分爲兩個範疇：第一種農業恐慌的形態，是出現在那些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已經主宰著整個國民經濟的國家中，「在那裡是由農產品的生產過剩促成生產大衆的貧困」；第二種恐慌形態，是出現在那些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等經濟發展的階段比較落後的國家中，在那裡一方面是受到帝國主義的宰割，另一方面則遭受封建勢力的剝削，「是生產力的薄弱，即生產量的不足，陷農民大衆於飢餓與死亡」。[30] 中國的經濟恐慌正以第二種恐慌的形態而體現著。所以伏爾加的觀點，正是馬克斯主義論者分析中國經濟恐慌的理論基礎。[31]

三、城鄉貿易條件不平等說

馬克斯主義論者以爲中國對外貿易上不等價交換關係的日趨擴大，同時也反映在城鄉間的交易上，且城鄉間不等價交換的本質，亦有日益擴大的趨勢。依據李紫翔的觀察，由於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大量價廉物美工業製品的侵入，中國農村原本保有的一種半自足自給或自足自給的狀態，「已在不可挽救的急速的破壞中」。儘管中國的農業生產，受到種種落後的生產方式的束縛，「不能資本主義化」，中國農民仍不能不一方面「被迫著轉變爲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購買者」；

28　見 E. Varga,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Its Political Consequences*, 該書內容曾被馬克斯論者如錢俊瑞等人譯成中文，刊載在 1934 年出版的《世界知識》雜誌上。

29　王德昭，〈世界經濟危機與殖民地經濟〉，《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卷 3 期 1（1934 年），頁 235。

30　錢俊瑞，〈中國農村經濟的破產〉，《錢俊瑞選集》，頁 86。

31　張仲實，許滌新，皆曾引述 E. Varga 的言語，說明此次經濟危機的成因和發展，見張仲實，〈資本主義底經濟危機論〉，《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卷 1 期 2（1934 年冬），頁 576；許滌新，〈貨幣戰爭及其對於中國經濟的影響〉，《東方雜誌》，卷 31 號 9（1934 年 3 月），頁 51。

另一方面，「又爲原料市場的生產者」。然而，無論是資本主義市場的購買者，或是原料市場的生產者，中國的農民及農產品在面臨世界市場「資本主義法則」的競爭之下，都須面臨原料價格的上漲，落在工業品之後，且其下跌速度又常較工業品速度爲快的事實。因此，農工業產品交換價格剪刀差的發展，必然使農產品對於工業品的交換，永遠處於一種不利的地位，其結果不徒使「農村永遠被制於都市」，並且使「農村之被榨取」，成爲「都市發展的主要條件」，[32] 最後農工階級乃成爲重重轉嫁之下的最後負擔者。

馬克斯主義論者因此指出，城鄉間農工產品價格剪刀差的擴大，是城市商業資本對農民進行加深盤剝的重要表現。而肆意剝削農民的商業資本的重大來源，則是中國買辦資本或官僚資本。[33] 陳翰笙就認爲，中國的軍閥和官僚永遠不可能，也永遠不會幫助農民擺脫他們所受的奴役。他們只想盡可能地繼續保持他們剝削的基礎。他並且認爲就外國資本家看來，這些軍閥和官僚幾乎是必不可少的，因爲他們使中國具有「貿易安全」的作用。帝國主義者不願站在起義農民的一邊，反而情願迅速提供援助以支持那些身兼地主的軍閥，這是不言可喻的。[34] 李紫翔則強調買辦制度在農村中所發生的「吸血管」的作用。他以爲買辦制度，不僅廣泛地樹立起其自身組織與其在商品流通上的壟斷地位，並且扶植和發展了帶著封建色彩的「行幫」制度以及舊式金融組織錢莊和新式的銀行，以爲買辦制度的重要骨幹。這種買辦，以及帶了「買辦」性質的行幫制，其所扮演商業資本的任務，是在推銷帝國主義者的工業生產品，以及過剩的農產品，同時又向農民購買廉價的農產原料，供給帝國主義的需要。所以，他們在這一商品流通過程上，「不僅在分取工業生產者與農業生產者的一部分利潤，更在保護並發展封建性的兩層（按：指買辦與帝國主義）不等價交換」，因此「又更加甚了農民所受

---

32 李紫翔，〈資金集中都市與資金回到農村〉，見千家駒編，《中國農村經濟論文集》現收於上海書店據1935年中華書局版影印之《民國叢書》，第2篇，號35，頁103-104；此一說法，又見李紫翔，〈中國經濟恐慌之觀察〉，《中國經濟恐慌與經濟改造》，頁16-18，該文有列表，說明工農產品價格之剪刀差的發展。

33 官僚資本：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在中國的通稱；買辦資本：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依附帝國主義並直接爲它服務的資本。見《經濟學辭海》（台北：東華書局，1993年），〈政治經濟學〉，頁10。

34 陳翰笙，《解放前的地主與農民——華南農村危機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頁10。

農產品與工業品間剪刀式價格差的損失」。[35]

三〇年代商業資本的構成，不只限於買辦型商業資本，同時包括地主型商業資本。馬克斯主義論者認爲這些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其性質等同於城市商業或高利貸資本對農民的剝削，從而使得農民所受剝削，遠遠超過了表面上農工產品價格差的損失。[36] 李紫翔就曾言及，三〇年代以來，農村經濟恐慌之深入，土地集中速度之高，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然而這些地主，尤其是軍閥、官僚和商人出身的新地主，十九都是「不在地主」，他們正以「對農民的超經濟剝削，來維持其都市的繁華生活」。[37] 錢俊瑞指出，「地主和富農是中國農村中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活動的主導」。商業和高利貸資本在中國農村中的猖獗，已經引起政府當局的高度重視。他們在分解農民經濟，在令農村階層急激分化的過程中，表現出最大的特長。[38] 至於猖獗的商業和高利貸資本，何以能使農村階層急激分化？（按：指部分富農地主竄升爲新的地主，而中下農民則成無產階級）據馬克斯主義論者指出，這是因爲他們中的一小部分已經自身兼做了資本家（最顯著的例子是軍閥兼辦實業和銀行），其餘也已經接受了資本的奧援。由於這種地主的興起，跟城市的民族資本有密切的關係，所以，封建勢力與本土的民族資本，不僅不在火併，而且在經濟和政治上建立了鞏固的聯合陣線，甚至以此一勢力爲基礎，做了帝國主義的附庸，作爲外國侵略中國的「前衛」。他們一方面宰割下層農民的剩餘生產物，一方面效忠於帝國主義的支配，從而使得下層（富農、地主除外）的農民，受到兩層的剝削。[39] 城鄉不等價關係，因爲此種雙層剝削的存在，自然更趨嚴重。

35　李紫翔，〈資金集中都市與資金回到農村〉，《中國農村經濟論文集》，頁104。

36　高利貸資本：以獲取高額利息爲目的的貨幣貸款。貸放的貨幣即高利貸資本。它主要存在於前資本主義社會，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也仍然存在著，「但只是作爲從屬的形式」。高利貸產生所需要的，歷史條件是，至少已經有一部分產品轉化爲商品，同時隨著商品買賣的發展，貨幣已經在它的各種不同的職能上得到發展，特別是支付手段的職能有一定的發展。它大致在原始社會末期就已經出現。見《資本論》卷25（北京：人民出版社），頁672，轉引自朱濤著，《〈資本論〉辭典》（山東：人民出版社，1988年），〈範疇概念〉，頁88。又在殖民地附屬國等商品經濟不發達的地區和國家，高利貸資本活動猖獗，其存在形式有貨幣借貸和實物借貸。見《經濟學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5年），〈金融卷〉，頁81。

37　李紫翔，〈資金集中都市與資金回到農村〉，《中國農村經濟論文集》，頁105。

38　錢俊瑞，〈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與農業改造問題〉，《錢俊瑞選集》，頁280。

39　同上註，頁278。

馬克斯主義論者顯然以爲，城鄉不等價關係的確立，同樣表現著帝國主義擴張之本質。因爲發揮此一城鄉不等價關係剝削功能的買辦和官僚資本，乃係附著於帝國主義之下，因此爲具有殖民地性質的封建經濟構造。半封建勢力，同時也爲資本的利益服務。因此，馬克斯主義論者以爲城鄉對立的形成，是城市在帝國主義的羽翼之下，依賴買辦資本和官僚資本等封建勢力爲主要媒介，向農民進行剝削，從而使其自身的資本主義，愈來愈發展。

就城市部分而言，據錢俊瑞的觀察，當時中國的民族資本（包括買辦和官僚資本），一方面由於農村破產，內地資金大部集中都市，一方面由於「外資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屈服，使買辦資本得在政治上積極加強其對於政府的控制，在經濟上積極加緊其對於工業的活動」，從而使「城市中的買辦資本相對於封建勢力，格外加強」。[40] 然而，在另一方面，中國的農民大衆，「正在上述帝國主義總的支配之下」，因城市中附從帝國主義的買辦資本與內地封建勢力的聯合宰剝，大批的走向破產或無產化。[41] 錢俊瑞因此說，在當前經濟恐慌一天天深刻，農村不安的情勢一天天嚴重的時候，「舊式的孤立的中小地主和別種半封建的勢力」，固然都在日漸衰替，但隨之而起的都是新興的地主。這種質的變化，並沒有使舊的「封建勢力走向自身的否定」，封建勢力依然殘存。不過，「新起的地主」「一定跟城市資本……具有密切的聯繫，有的甚至自身就是城市有產階級」。[42] 於是，城市與鄉村的對立，漸漸變成了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對立的具體化身。

農民所受打擊，既然遠遠超過城市資本主義經濟，農村經濟的破產，實際上則擴充了城市資本主義經濟。李紫翔說，許多人詫異著：「農村破產與少數大都市的畸形發展」，能同時並存。依他的觀察，「通商口岸」之能維持畸形和腐朽的繁榮，是因爲它們的發達，乃以農村經濟的破產爲前提。「中國農村的資金，被通商口岸的『吸血鬼』吸吮乾涸了」，最後更流至帝國主義者的國家。[43] 因此，資金由農村大批流向都市，證明帝國主義經過宰割中國之堡壘的「租界」——近代大都市，在經濟上統制了全中國。他以爲這些流出的資金，既然脫離了

---

40 錢俊瑞，〈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與農業改造問題〉，《錢俊瑞選集》，頁 286。
41 錢俊瑞，〈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與農業改造問題〉，《錢俊瑞選集》，頁 281。
42 同上註，頁 278。
43 李紫翔，〈資金集中都市與資金回到農村〉，《中國農村經濟論文集》，頁 102-103；〈中國經濟恐慌之觀察〉，頁 5。

再生產的過程，就使得中國整個農村，愈發受到封建地主、高利貸和商業資本的剝削。「那怕農產品的大部分已經商品化，而帝國主義和封建的剝削，終將阻塞了中國農業生產方式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44]

因此，中國農村，永久持續著入超，它的最深刻的意義是中國勢將持續面臨工農產品價格差的損失。[45]李紫翔描述這樣的過程：「中國的農業生產者不僅要負擔一般資本主義國家之工業品與農產品之交換價格差的損失，並且因輸出輸入商品，均爲各帝國主義銀行、洋行，以及爲其所操縱的中國買辦商業機關獨占……。，輸入的洋貨，每在世界市場價格之上，而輸出的土貨，則又在世界市場價格之下，壟斷中國市場價格，攫取特殊買辦利潤，從而更增大了工農產品——洋土貨之價格剪刀式的差額」。[46]

四、抵制通貨戰爭

馬克斯主義論者主張抵制通貨戰爭的目的在抑低匯價，限制輸入，刺激輸出，進而平衡中國之對外貿易。

一九三〇年代，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的方式並非如上述的以商品輸出爲主，而是由商品輸出向資本輸出推進。所以，馬克斯主義論者以爲，一九三〇年代帝國主義對中國此一半殖民地的影響，已進入財政資本時代。[47]

資本輸出的意義增強，同時意味著宗主國與殖民地間關係的轉變。孫冶方[48]

44　李紫翔，〈資金集中都市與資金回到農村〉，頁102-103。

45　李紫翔，〈中國經濟恐慌之觀察〉，頁5；李紫翔，〈拉西曼報告書之農業部分的批評〉，《中國鄉村建設批判》（上海：生活書店，1936年），頁74。

46　李紫翔，〈拉西曼報告書之農業部分的批評〉，頁74。

47　按：財政資本即金融資本。依據馬克斯史觀，認爲金融資本是壟斷的銀行資本與壟斷的工業資本融合或混合的一種資本的新形態，「它產生的經濟基礎是生產的集中；它形成的過程是生產集中發展到一定的階段，而達到壟斷」。它的主要特徵是：「規模巨大，通過參與制等辦法，支配著龐大的社會財富；不僅控制銀行業，而且還控制工業、商業、運輸業及其他經濟部門；富於掠奪性和侵略性，不擇手段地追逐高額壟斷利潤，甚至通過發動戰爭來發橫財；控制著國家政權，使國家機器下屬於自己。金融資本的形成是帝國主義的經濟特徵之一。」見劉鴻儒主編，《經濟大辭典（金融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7年），頁112-3。

48　孫冶方(1908～1983)，原名薛萼果，曾用名宋亮、一洲、寶山、方青，江蘇無錫人，曾就讀莫斯科中山大學，曾開設新知書店、中國經濟資料室、發行《中國農村》月刊、曾任淮南津浦路西地委宣傳部部長、蘇皖地區貨物管理總局副局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副局長、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著有《關於國家經濟建設和國家資本主義》、《關於"資產階級法權"》、《關於改革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幾點意見》、《社會主義經濟論》。見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石家莊市：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782。

認爲，在此之前的工業資本時代，宗主國榨取殖民地的方式是商品輸出，宗主國對殖民地的關係主要是賣主同買主的關係。隨著宗主國對殖民地投資的增加，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除了是宗主國工業品的顧主以外，雙方更有債權債務的關係。就商務關係而言，宗主國把商品銷售脫手，換成了現款以後，資本家的目的就已達到；殖民地的喪失，對於他們而言，主要只是喪失了未來的銷售市場而已。但站在投資立場而言，殖民地的喪失，不僅是失去了未來的投資市場，而且要危害到宗主國對殖民地已經投入的資本。所以資本輸出愈發展，宗主國愈不願殖民地獨立或被別的帝國主義國家侵佔。[49] 章乃器[50] 因此認爲：帝國主義由商品輸出推進到資本輸出以後，國際爭奪的對象增加了，「除了商品市場以外，還有原料市場，勞工市場，金融市場，資源、交通等項目。」[51] 由此可知，銷售市場、原料市場和投資範圍的競爭激烈化，就是爲投資市場尋求出路的結果，就是資本主義轉成金融資本主義後必然發生的現象。

馬克斯主義論者同時認爲，三〇年代國際對華投資的爭奪，表現於英美方面的，就是國際間貨幣戰爭的開始。[52] 章乃器指出商品市場爭奪的方式，「通常是跌價傾銷」，是「用政府的津貼，賠償出口商人跌價的損失」，是「和別國締結特惠關稅條約」，取得市場的獨占。這種種的方式，在經濟戰鬥開展到最激烈的時候，往往覺得不夠，因此貨幣戰爭便成爲必要的了。他並且說「貨幣戰爭在商品市場所表現出來的，是用『國家法令』減低貨幣的價值，是用停止金本位或者減低貨幣內含金的分量的種種手段，使自己的貨幣價值低跌。」這樣做的目的

---

49 孫冶方，前揭書，頁 153-154。

50 章乃器 (1897～1977)，浙江清田，1918 年畢業於杭州浙江省立甲種商業學校。嗣任杭州浙江實業銀行練習生、北京通州農工銀行營業主任、襄理兼營業主任、北京中美實業公司會計主任、浙江實業銀行營業部主任、《新評論》半月刊主編、中國徵信所董事長、中國興信社幹事、中國銀行公會理事、上海光華大學教授、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生存線》、《暴風雨》等刊物編務。著有《章乃器論文選》、《出獄前後》、《抗日必勝論》、《中國貨幣論》、《國際金隔問題》、《中國貨幣制度往哪裏去？》等。見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石家莊市：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年），頁 862。

51 章乃器，〈列強在華貨幣戰爭的現勢〉，見氏著，《中國貨幣金融問題》（上海：生活書店，1936 年），頁 163。

52 章乃器，〈列強對華貨幣戰爭的現勢〉，《中國貨幣金融問題》，頁 164。

是提高本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因爲貨幣的跌價使她的商品在海外的市價低落了」，這就是所謂「貨幣傾銷」。[53] 錢俊瑞也以爲，國際貨幣戰爭如火如荼的進行，一方面固然是經濟恐慌加深的結果，是各國統治者不得已的措施，但在另一方面，帝國主義者同時就可利用這種貨幣跌價，奪取市場，來加強自己對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競爭能力。因爲貶低幣值，既可以加緊對工人的剝削（因爲工資不能跟貨幣跌價同比例地提高），因此在出口貿易中，可以得到一筆額外利潤。它們因此可以用這種得到額外利潤的可能性爲基礎，在世界市場上廉價傾銷，排斥其他國家的商品。[54]

錢俊瑞認爲這一政策基本上是符合資本家需求的。他以爲貨幣戰爭是通貨膨脹政策的發揮。在通貨膨脹之下，可以增加貨幣的數量，以價值的跌落，反映物價的高漲，進而增加資本家的收益。另一方面，這一政策在上述條件的配合之下，各國又同時運用降低價值的手段，使匯價低落，用傾銷的方法，鼓勵資本家去開展他們的海外市場。他曾就此加以說明：

> 目前的資本家們，左手壟斷了商品，右手壟斷了貨幣。用右手的貨幣直接去購買左手的商品呢，他們非但沒有偌大的消費力，而且也不會那樣的愚蠢。拿右手的貨幣分散給大眾，以增加購買力吧；或者拿左手的商品分散給大眾去消費吧，那又都是現社會制度下不能想像的事，因爲這樣便根本沒有資本主義社會了，在這種情形之下，資本家唯一的出路，只有用通貨膨脹的手段，去增加右手貨幣的數量，企圖用價值的跌落，來反映物價的高漲。他們只有運用降低幣值，使匯價低落，用傾銷的方法，去展開他們的海外市場。[55]

然而，貨幣戰爭更積極的意義是在金融市場的奪取上。由於放棄金本位是貶低幣值、實施通貨膨脹的前提，馬克斯主義論者如許滌新、錢俊瑞等人皆以爲

53　章乃器，〈列強對華貨幣戰爭的現勢〉；又見〈矛盾百出的世界經濟會議〉，《激流集》（上海：生活書店，1936年），頁340；因爲貨幣戰爭，「是以貨幣政策的改變，作爲爭奪商品市場和金融市場的手段」，許滌新說：「貨幣戰爭的目的，在厲行傾銷。」亦即以「通貨膨脹，降低實質工資，減輕生產費用，厲行匯價傾銷，去奪取國外市場。」見許滌新，〈貨幣戰爭及其對於中國的影響〉，《東方雜誌》，卷31號9（1934年5月），頁53。

54　錢俊瑞，〈中國貨幣制度往那裡去〉，見《錢俊瑞選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407。

55　錢俊瑞，〈中國貨幣制度往那裡去〉，見《錢俊瑞選集》，頁407。

1931年英美各國放棄金本位，各國對華貨幣戰爭就開始了。[56] 至於貨幣戰爭何以在爭取金融市場上，具有更大的效用，馬克斯主義論者認爲，帝國主義列強在爭奪中國市場的時候，只靠他們自身幣價的上落來加強他們的陣地，力量是不夠的。錢俊瑞說：「英國固然貶低了幣價來對華傾銷了，而美元的跌價，可以比英鎊跌得更凶，同時它還能利用它雄厚的資金，使中國的銀價提高，使得銀元的購買力較高；這樣英國就無可奈何了。可是美國單是這樣做法，也是不見大效的，因爲日本還有生活程度更低的勞工，可供資本家犧牲，它可能使日元的價格降得更低，這樣美國能奈何它呢？」[57] 所以錢俊瑞認爲，商品市場的占取，有賴於金融市場的維繫。爲了金融市場的爭取，帝國主義必須用貨幣戰爭的手段，使宗主國與殖民地間的貨幣有所聯繫。他說：「原來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的貨幣，要使它成爲自己的附庸，是殖民地經營中不可少的步驟。只有在殖民地貨幣同化於宗主國之後；然後宗主國間的貿易，以及政治、經濟上的投資，可以圓滿地開展。」這是因爲匯兌穩定了，無論進行商品買賣或進行投資，所負的危險較輕。[58] 所以，帝國主義者爲要全盤控制中國的市場，它們不得不更進一步在中國的貨幣制度上設法，以便全面控制中國的財政金融，這就展開了列強對華貨幣權的爭霸戰。

根據上述，馬克斯主義論者以爲，一般人對於前言部分曾經言及造成中國經濟恐慌的美國白銀政策的估量往往只是片面的。他們認爲白銀政策的終極目標，除準備未來大戰和在美國國內加強通貨膨脹之外，最重要的，乃在取得中國的貨幣權。錢俊瑞認爲，若謂羅斯福的白銀政策是在取悅代表銀礦主利益的銀派議員，雖是對的，然而是不夠的；因爲「美國的收買白銀政策，如果只是爲了銀礦主的利益，絕沒有使它世界化的必要。」他認爲白銀政策的終極目標，除了加緊國內通貨膨脹之外，最重要的，「乃在取得中國的貨幣權，甚至要控制南美和遠東方面，採用虛金本位制各國的貨幣權。」羅斯福總統爲要替美國在遠東和南美開拓廣大的商品和原料市場，並且取得世界最大富源中國的貨幣權，以決定英鎊和美元之爭的最後勝敗，才提出了這樣一個爲美國整個資本家階層謀利益的白銀

56 許滌新，前引文，頁53；錢俊瑞，前引文，頁413。
57 錢俊瑞，前引文，頁414。
58 錢俊瑞，前引文，頁414。

政策。他並且認爲只要美國的白銀收買到相當程度，白銀價格穩定，其對於美元的比率固定，那麼，中國的銀本位幣就可以完全跟著美金的變動而變動，中國也就自然的加入了美元集團。[59] 章乃器完全同意上述的觀點，他也認爲美國收買世界白銀的目的，「無疑的是有向外攻略的意味的」。所謂提高遠東和南美購買力的說法，「不過是向外攻略底白銀政策底一種掩飾而不是眞實的內容」。白銀政策的終極目標，既是在取得中國的貨幣權，甚至遙控南美和遠東方面採用虛金本位制各國的貨幣權。也就是說，「牠要爲牠的金融資本在南美遠東開闢廣大的投資市場；要爲牠的產業資本，在南美及遠東開闢廣大的商品及原料市場。」章氏並且以爲：「美國只有依賴這樣一個爲牠的整個資產階級謀利益的白銀政策，然後可能在議會裡得著多數的同意。」[60] 至於此一政策實施之後的結果，是否能提高遠東和南美人民的購買力，章乃器則指出，「提高購買力的話也許是對的，然而只在取得各國底貨幣權以後，而且也只能提高對於美國商品的購買力；整個的購買力即使不在貨幣戰爭過程中毀滅，但是決不會提高的。」[61]

1934 年英商匯豐銀行和麥加利銀行、大英銀行等在美國宣布白銀國有之後，由上海裝運大量白銀出口。錢俊瑞表示，在營業上，或許可以認爲這些銀行的做法是提防中國政府干涉白銀出口，甚至改革幣制（如銀元貶值，或發行不兌現紙幣），以及賺取一些運銀出口的利潤。然而他更強調，這種舉措在貨幣戰爭上所具有的更重大意義，亦即英鎊對美元的「以退爲進」策略的運用。[62] 所謂「以退爲進」的政策，就是眼見美國白銀政策來勢洶湧，英國便授意收回自己在華的資本，挖盡中國的白銀，先把中國的金融和工商業市場徹底破壞，如此，「即使美國能夠取得中國的貨幣權，它在中國也無從發展它的貿易和投資。」[63] 章乃器也說，英國的行動正是給美國的警告，它一方面透露：「倘使英國金融勢力由中國退出，毀滅了中國市場，則美國取得貨幣權之後，即不可能發展它的投資和貿易。」另一方面也反映：「中國人若認定這是美國白銀政策的直接結果，進而醞釀一種反美氣氛，將使美國奪取中國貨幣權的企圖，遭受到重大的打擊。」

59　錢俊瑞，前引文，頁 417 。
60　章乃器，〈英美在華的貨幣戰爭〉，前揭書，頁 143-144 。
61　章乃器，〈英美在華的貨幣戰爭〉，前揭書，頁 143-144 。
62　《申報》，1934 年 8 月 11 日，版 9 。
63　錢俊瑞，前引文，頁 9 。

[64] 不過，章乃器也提醒，這同時也是給中國的一個警告，亦即中國不能用自製的紙本位去反抗美國的白銀政策，也不能控制匯兌以奪取外商銀行——尤其是英商銀行——營業勢力的舉動；中國必須投入英鎊集團以反抗美國，更必須放棄平衡稅以自定匯兌行市的企圖。因爲這些作法顯示，中國可能進行獨立自主的幣制改革，無意淪爲英鎊的附庸，而這可能危及英國金融資本的在華利益。

由此可知，馬克斯主義論者認爲貨幣政策的調整，是帝國主義各國進行侵略爭奪的重要手段，而中國的金融危機，從本質上來說，正是這種侵略爭奪所導致的。但是馬克斯主義論者顯然並不認爲僅僅從國內著眼探求幣制問題的改革即可解決整個社會問題。針對國內不少學者對三〇年代前期日趨嚴重的貨幣金融危機所提出的各種幣制主張，章乃器、錢俊瑞、駱耕漠、狄超白進行了總體批判。他們認爲：「中國目下種種樣式的幣制政策論，都逃不出通貨膨脹論。」其中著眼於農村金融者，主張「使人民在產品或者勞力尚未賣出之前，就能取得貨幣，使金融不至枯竭」；著眼於都市物價之跌落以及政府財政之困難者，他們的共同目標，則是「抑低幣價，抬高物價，刺激人民的購買」，同時「使政府能以改革幣制的餘利，渡過目下的財政難關」，將來更可「利用低廉的資金市場，減輕債務上利息負擔，而且以便於發行新債。」[65] 然而，在他們看來，在國內政局黑暗腐敗的條件下，某些局部的幣制解決方案，恐怕也是徒然無功，不過使「軍閥、官僚和豪紳們，能用新的口號加重農民的壓迫吧！」[66]

然而反對高估貨幣的作用，並不是說不應該進行幣制改革。錢俊瑞、章乃器等人仍主張實行管理貨幣，他們說：「倘使中國要爭取民族的解放，我們應該主張：中國要有一個獨立的貨幣本位和穩定的貨幣價值，這就是改用自己的管理貨幣的主張。」[67] 獨立的貨幣本位自然不能加入任何國際性的貨幣集團。在此基礎上，他們也不反對實行通貨貶值，他們表示：「爲了農民和民族工業的利益，我們應該減低幣價以抬高物價，爲了進出口貿易相對的平衡，我們也需要抑低匯價，以限制輸入、刺激輸出。」儘管，他們仍然警惕：「這只具有一時的作用」，

---

64 章乃器，〈英美在華的貨幣戰爭〉，前揭書，頁 145-146。
65 〈中國貨幣制度往那裡去〉，頁 431-432。
66 章乃器，〈中國貨幣的前途〉，《中國貨幣金融問題》，頁 22。
67 章乃器，〈中國貨幣的前途〉，《中國貨幣金融問題》，頁 224。

中國根本的出路，是要從「侵略和剝削中間解放出來」。[68]

五、抵制外資

馬克斯主義論者以爲抵制外資可以避免民族資本成爲國際資本的一部分，或者使民族資本被國際資本吸收，進而導致國內資本的大量外流。他們以爲如此可以掃除一部分半封建、半殖民勢力在中國盤根錯結的局面。

馬克斯主義論者以爲，財政金融時代的特點在資本輸出，由於在世界經濟恐慌的資本主義總危機期間，中國已成爲國際金融資本的主要目的地。[69] 隨著帝國主義對華經濟勢力日益增大，列強對華輸出的資本不免也愈益增加。依據 Remer 氏的估計，外人在華投資，1902 年時不過 787,900,000 美金，1914 年爲 1,610,300,000 元，1931 年時則爲 3,242,500,000 美金，從 1902 年至 1931 年三十年間約增加四倍以上。可以想見國際金融資本在中國的活躍。[70] 王昆崙[71] 據此強調，列強輸華的全部資本，可以說都是在「推進殖民地與先進國間的一切市場關係，使中國在國際金融資本的控制下，走上更殖民地化的途徑。」[72] 因爲根據 Remer 的著作，他發現，帝國主義的對華投資，「除由政府以信用的方式輸入及由本國商業信用的方式輸入以外，而以外人直接移植於中國各條約口岸爲最主要的方式」。這數額幾乎要佔各國投資總額的四分之三。其目的主要是在中國此一半殖民地上，「利用這種種落後的條件，實現他們的額外利潤」。所以這些外資，80% 以至 90% 是用在銀行資本、進出口商業資本、鐵路資本以及政治借款上。[73]

李紫翔曾經指出：「帝國主義者在華銀行，是他們所有經濟勢力的發電機。」

---

68 〈中國貨幣制度往那裡去〉，頁 434。

69 王昆崙，〈世界經濟恐慌與殖民地現狀〉，《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卷 1 期 2（1934 年冬季號），頁 601。

70 同上註，頁 600-604。原又見 C. F. Remer,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68), p.58.

71 王昆崙 (1902 ～ 1985)，江蘇無錫人；北京大學哲學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秘書長，組織中國民主革命同盟，組織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北京市副市長。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石家莊市：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年），頁 80。

72 同上註，頁 602。

73 同上註，頁 600-604

據他對外國銀行最大集中地——上海所做的調查，他估計，帝國主義各國銀行在此投資總額約有美金一萬五千萬元，已多於全體華商銀行的資本三倍以上。由於有此龐大的資本做後盾，中國的進出口貿易，經過外商洋行而完全受其壟斷；各國在華航業、礦業及製造工業，又無不受其操縱或經營；外國政府的政治和交通等借款，亦經其貸給中國政府；並且，作爲這些借款之抵押品的中國交通實業和關鹽稅收，其監督、管理與保管權，亦無不在外國銀行家的支配之下。此外，中國軍閥官僚的巨額存款，亦均以低利存入外國銀行。李紫翔乃稱「帝國主義者金融資本，……充分的發揮其榨取中國乃至促使中國殖民化的效能。」[74]

馬克斯主義論者認爲在這以前的工業資本時代，資本的勢力只限於商品流通的範圍，並沒有接觸到生產的範圍；到了這時代（財政的資本），資本開始直接統治殖民地的生產。[75] 孫冶方認爲，資本輸出雖把資本主義的生產移植到落後國家，卻不曾使全世界的經濟發展都與宗主國的水準「向『右』看齊」，反而加強了全世界經濟內部的不平衡性。其部分原因，乃是「宗主國輸出的資本並不是完全用以開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生產事業，反之，用在這一方面的資本只佔輸出總額之極小的一部分。」[76] 這正說明列強雖握有半殖民地經濟的主要支配權，卻也只是把半殖民地的經濟發展引向宗主國所需要的方向。

外資支配下發展的產業，其主要目的，在於壟斷原料和賺取利潤。李紫翔以爲前者的例證，可舉日本說明。他以爲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鐵礦和煤礦，均是維持日本帝國主義者黷武主義所必需的資源。後者的例證，李紫翔以爲可舉英國說明。英國之煙草公司以及煤礦公司，在世界經濟大恐慌深入和擴大的現階段，每年仍有巨大的利潤，其廠礦公司之所在，乃成爲帝國主義「勢力之保壘和發展勢力範圍的中心」。「切斷和破壞中國政治與經濟的機構」，同時也就是「壓迫中國民族工業的蝕骨之蛆」。[77] 孫冶方也強調，資本輸出並沒有促成殖民地半殖民地重工業的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幾乎完全沒有」。他進一步說：「宗主國的資本非但不願造成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重工業，而且，即

74 李紫翔，〈上海之金融地位、性質及其前途〉，《申報月刊》，卷3期2，頁24-25。
75 同上，頁35。
76 同上，頁37。
77 李紫翔，〈我國利用外資之過去與將來〉，《東方雜誌》，卷3期5（1934年），頁25。

便是「輕工業投資亦只限於某一部分範圍內」。他並且以爲，在宗主國資本家看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應該永久成爲農產品和原料的供給者，成爲宗主國工業的農業附屬地。「他們深怕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業發達之後，將成爲自己有力的競爭者」。[78]

馬克斯主義論者同時認爲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外國資本的發展和民族資本的發展代表不同的意義。他們認爲，資本主義國家工業之發展，與一切前資本主義關係是勢不兩立的，如前者愈發展，則後者愈衰退。所以他們又認爲外資工業的發展，只會打擊自己的競爭者 —— 中國的民族工業。孫冶方就說外資工業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享受種種特權，有租界，治外法權等作爲依據，所以成了一種超然勢力。許多落後的社會政治關係，可以成爲民族資本工業發展的桎梏，但並不能拘束外資工業的行動。即使後者受到相當束縛，但不如民族工業所感受的那樣苛重。所以外國工廠的商品可以跳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封建割據的壁壘，在納稅方面長期享受種種特權，並且容易擺脫各種苛捐雜稅的負擔，因而造成外資企業壓榨民族資本企業的局面。[79]

中國大部分的民族資本逐步地向外國資本投降，結果它只做成帝國主義資本在華流轉過程的一個環節，它所能得到的好處也就是外資「在中國大衆身上所取得的額外利潤中的一部分，即「買辦利潤」。馬克斯主義論者以爲，中國民族資本這種買辦化的過程，在這次經濟恐慌期間，發展得特別顯著。錢俊瑞說：恐慌的狂飆，把所謂眞正的民族企業吹得煙消雲散。「幾個碩果僅存的『民族』工廠，不是給外資收買，便是抵押給國內的銀行資本。國內買辦性的金融資本一天天變成中國『民族』資本的支配型態；中國整個經濟生活就主要透過了這種金融資本，把支配權交給帝國主義。」[80] 孫冶方也說，在帝國主義向中國輸入的商品，絕大部分是消費資料，而屬於生產資料的數額是極其微小的。他並認爲我國由外國輸入的物品愈不是生產資料，而愈是消費資料或奢侈品，這就必然使我國社會存在的買辦商業資本及配合買辦商業資本的其他資本型態得到日益發展，並

78　孫冶方，前引文，頁 42。

79　孫冶方，〈財政資本的統治與前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關係於中國社會及其革命性質的若干問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1985），頁 40。

80　錢俊瑞，〈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與農業改造問題〉，頁 277。

更加依附於國際資本，而成爲國際資本的一部分。[81]

在民族資本逐步被國際資本吸收之際，馬克斯主義論者以爲殖民地想利用外資以開發本國經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依據孫冶方的觀察，宗主國對殖民地投資所得的利潤當然比較宗主國本國的投資要豐厚。這豐厚的超額利潤之大部分並不留在殖民地做爲擴張生產之用，它成了宗主國的無形出超的收入，造成宗主國內部「一大批吃利子者的奢侈生活，所以宗主國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投資僅是吸收豐厚的超額利潤的一個唧筒而已」。[82] 李紫翔也有同樣的觀感。他以爲「利用外資，無論從那一方面來說，於中國都是有百弊而無一利」。事實顯示，利用外資的結果，是「國際帝國主義共同宰割半殖民地的經濟，或者是武力的瓜分」。所以他認爲，「我國之迫切需要資本與擴張帝國主義者在華經濟勢力」，儘管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然而，假如帝國主義在華的政治經濟勢力與制度，沒有徹底的改變，「即使將被動的輸入外資，變爲自動的利用外資之形式」，受利者爲彼不爲我，是可以逆睹的。[83]

根據上述，馬克斯主義論者認爲財政資本，即金融資本的侵入，不只是半殖民地國度中創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先驅者，同時也是這些地方封建殘餘勢力的維持者。因爲依據孫冶方的看法，在此財政資本時代，國際金融資本爲追求超額利潤而侵入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這些經濟落後國家的廉價勞力，和這勞力所產生的廉價原料，便是超額利潤的來源。由於廉價原料和廉價勞力都是前資本主義的、封建剝削關係下的產物。財政資本爲追求超額利潤起見，自然先要保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關係。因此，歐、美資本主義破壞了東方各國的自然經濟體系，把後者拉進了世界商品流通的洪流之後，並不會成爲許多國家普遍自由的資本主義發展發動者，反而會成爲封建落後關係的維護者。[84] 錢俊瑞也說，在外資的鉗制底下，半封建的勢力固然不能轉變成近代的資產階級；就是本土資本也還是沿用舊式資本（即商業和高利貸資本）的剝削方式，並

81 孫冶方，前引文，頁 40-43。
82 孫冶方，前引文，頁 44。
83 李紫翔，〈我國利用外資之過去與將來〉，《東方雜誌》，卷 31 號 5（1934 年 3 月），頁 29。
84 孫冶方，〈財政資本的統治與前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見氏著，《關於中國社會及其革命性質的若干理論問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年），頁 30-31。

不向近代的資本主義生產前進。[85] 換句話說，殖民地的落後經濟和勞動大衆的貧困化，都是宗主國經濟繁榮的另一面。資本主義對殖民地的統治和殖民地自身的資本主義關係非但不矛盾，後者且是造成資本主義生產的重要基礎之一。

六、抵制農產品傾銷

馬克斯主義論者認爲帝國主義國家以工業品的傾銷增加農民的支出，又以農產品的傾銷減少農民的收入，造成中國農村經濟嚴重恐慌的局面。抵制農產品傾銷，可以降低中國農村破產的程度，儘量肅清「資本主義崩潰中的封建殘餘」。（參見下文）

馬克斯主義論者認爲，自從帝國主義侵入後，中國農民的農產物貿易關係不僅和全國國民經濟保持著密切的關係，而且倚附於世界市場，與國際經濟發生了繁複的聯繫。依據馮和法[86]的說法，自從帝國主義侵入後，中國國際貿易的數額日趨擴大，亦即農產物加速流入國際商品市場。他認爲，現在中國的對外貿易，農產品固然是主要或唯一的出口資源，但各地農作物的種植，也漸有以國際市場的需要爲依歸的趨勢。因此，在農作物種植方面，由「自足植物而改種以作原料爲主的商品植物的轉變，更是各地皆是」，遂使中國農作物依賴於國外市場。其中最明顯的例子，莫如東三省的大豆，又如祁門紅茶的買賣，「大部也取決於洋商」。[87]

中國農業商業化的命運，主要取決於帝國主義，依附於國際市場，而不是取決於國內市場的需要。世界經濟恐慌發生後，資本主義國家不但吸收中國的農產物原料，同時也和其他工業品一樣，將過剩的農產物傾銷到中國，此一形勢，有愈演愈烈的趨勢。[88] 馮和法於是發現，中國市場內充斥著進口的農產物，這些

85　錢俊瑞，〈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與農業改造問題〉，《錢俊瑞選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284。

86　馮和法(1910～)，筆名馮靜遠，浙江鄞縣人；國立勞動大學畢業，曾任《國際貿易導報》主編、《新生日報》副刊編輯、上海工商調查所所長；《農村社會學大綱》、《中國農村經濟資料》、《中國農村經濟論》、《社會學與社會問題》。見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石家莊市：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1177。

87　馮和法，〈中國農產物貿易問題〉，《國際貿易導報》，卷6號8（1934年8月），頁178。

88　同上註。

進口的農產物，並非中國確切所需，從而造成農產物價格的下跌。其價格甚且遠低於「中國農民的農產物價格成本之下」，終而「形成『豐收成災』」，使國產的「農產物在原產地腐爛，而不能運銷於市場。」[89]

國際市場、帝國主義決定中國農業商業化的命運。首先，國際市場農產需要量的大小，制約著中國各類農產品生產規模的大小，以及生產活動的盛衰。馮和法認爲洋米洋麥傾銷後，國產米麥的自足性降低。這一現象充分表現了，國外市場的需要情形，可引起中國農作物生產上的變動。如此一來，「農村經濟遂受國際貿易的牽動，而破壞了本來的自足性。」[90] 薛暮橋也指出國產米糧自足性的降低，正說明1931年後資本主義國家與中國此一半殖民地間的經濟關係，有與理論上說法日趨違背的趨勢。他說，在理論上，「資本主義」的國家推銷其過剩商品及掠奪農工業原料，「中國國際貿易上必是製造品進口而農產原料品出口」。但是近年來，中國農產物進口與日俱增的事實，表示「農村之爲外貨市場的擴大」，但那是中國農村自足性的破壞，而不是中國已經工業化。所以中國農村對國際市場農產需要量的增加，「就是中國農村經濟恐慌的特徵」。[91]

其次，馬克斯主義論者以爲，農產品價格的形成並非取決於中國農產品的生產成本，也不取決於中國國內市場的供求關係，而是受帝國主義的支配及世界價格的現象影響。陳翰笙、王寅生就曾指出：「大部分的糧產，每年爲日本、英國、美國、丹麥等地方所吸收，糧價完全要靠國際市場爲轉移，不能自由伸縮。」[92] 對於這點，馮和法也表示同意。[93]

馬克斯主義論者認爲，在上述情況下，中國農民雖與世界市場的聯繫加強，卻促使中國國內市場走向日漸縮小的命運。馮和法強調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農產品的傾銷，是「大經營之打擊小經營」。各資本主義國家，「以其資本主義生產的大農經營優勢，自必成本較廉，價格較低」，再以如此的優勢條件，運輸到中

---

89 同上註。

90 馮和法，〈復興農村與國際貿易〉，《國際貿易導報》，卷5期6（1931年6月），頁128。

91 錢俊瑞，〈中國現階段的土地問題〉，《錢俊瑞選集》，頁238。

92 陳翰笙、王寅生，《黑龍江流域的農民與地主上海》（上海：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1929年），頁10。

93 馮和法，〈中國農產物貿易問題〉，《國際貿易導報》，卷6號8，頁178。

國，「必然排斥了中國農產品市場」。[94] 孫曉村也指出，中國的國內市場，除了成爲「國際農產品的尾閭外，還有一個不可忘懷的事實，就是國內市場是在日漸縮小。」[95]

馬克斯主義論者對增加關稅以抵制傾銷的關稅戰爭表示支持，但更充滿了警覺。他們明白帝國主義以擴大國內生產解決危機的方策已然失效，從而展開了爭奪國外市場的替代方案。誠如王德昭所說，這些替代方案就是「爲了要獨占國內或從屬地的市場而起的保護關稅政策底實行；因了要推銷大量的過剩商品以及在競爭上獲得勝利而起的傾銷政策底採用」。於是對中國而言，無論是避免各國關稅政策對中國的影響，或是抵制各國對華傾銷，都有必要採行保護關稅。而採行關稅的最終目的，則在避免中國此一「舊殖民地的再分割和半殖民地底淪爲殖民地」。[96]

馬克斯主義論者因此推斷，在中國此一以農村經濟爲主角的殖民地經濟型態裡面，農村破產，亦即中國經濟破產的原因，「帝國主義經濟侵略及其有害影響占據了主導地位」。章乃器曾經指出：貿易的入超，就是代表國際資本主義剝削，因爲大量外貿的湧入，一方面使農村中固有的手工業消滅；另一方面，使國內農產物跌價，而造成嚴重的「穀賤傷農」狀態。國際資本主義以工業品的傾銷增加農民的支出，再以農產品的傾銷減少農民的收入，這是對於農民「雙斧伐樹」式的剝削。[97]

章乃器進一步分析中國農村經濟凋蔽的實質，指出：「照歷史的路線看起來，封建殘餘的中國農村組織，它的崩潰本來是必然的，但是目下中國農村破產的意義，已遠不是那樣的單純。它在縱的方面，固然帶著歷史上封建制度崩潰的遺跡；而在橫的方面，是更嚴重的受著國際資本主義崩潰的影響。」據此他認

94　同上註。

95　孫曉林，〈中國農產商品化的性質及其前途〉，《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卷1期1（1934年8月創刊號），頁219-238。

96　王德昭，〈世界經濟危機與殖民地經濟〉，《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卷3期1（1936年1月春季號），頁236。

97　章乃器，〈崩潰中的中國經濟社會〉，《激流集》（上海：生活書店，1936年），頁289。

爲：「中國農村的破產，不是代表封建制度的崩潰，而是代表資本主義的崩潰。」然而，他又以爲倘使一定要說明此一現象和封建制度的關係，或者不妨說：「這是資本主義崩潰中封建殘餘的肅清。」[98] 據此，吾人似乎可以理解，馬克斯主義論者何以認定 1927 年後中國革命的階段性任務必須訴諸於反帝國主義及其封建代理人的革命。[99]

七、以幣制改革爲基礎的土地改革

馬克斯主義論者以爲，一九三〇年代以後，舊式的一種孤立的中小地主，或者說一些「土地主」在日漸衰落，隨之而來的是新地主的興起。錢俊瑞據調查說，1935 年四川的十個縣的調查，地主田產中屬新興地主的占 87.3% ，舊地主只占 9.1% 。又因軍閥、官僚、商人和企業家大多居於城市，因而使不在鄉的比重大大增多。他認爲這種新興勢力，與官僚或城市資本有更密切的聯繫；有的甚至自身就是城市資產階級。[100]

新興地主是多方面的人物。陳翰笙即如此描述，他說道：「中國的地主與外國的不同，大都是多方面的人物。……許多的地主兼高利貸者，可以變成地主兼商人，許多的地主兼商人，又可變爲地主、商人、兼政客，同時許多商人、政客，也可變爲地主。地主大半有槽枋，油廠及穀倉。另一方面，貨棧及什貨店主人，就是土地受押人，終究要變爲土地的主人，這是著名的事實」。[101] 這說明地主階級因爲占有社會主要生產資料及土地最豐饒的部分，他們不僅在農業中，而且在工業、商業中也有強大力量。他們的勢力通過商人、高利貸者、軍閥，後來甚至結合上帝國主義者，伸入經濟、政治各領域。他們因此是收租者、軍閥官僚、商人和高利貸者四位一體的。

新興地主，因此表徵著不同於舊式的新地主的興起，這正是大地主時代的來臨。馬克斯主義論者以爲，在資本主義沒有充分發展的情況下，由於地租的剝削

---

98 同上註，頁 288 。

99 林海譯，〈 1927 年國共分裂後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戰後的一場爭論〉，《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輯 1 。

100 錢俊瑞，〈 中國現階段土地問題〉，《錢俊瑞選集》，頁 238 。

101 陳翰笙，《陳翰笙文集》（ 上海：復旦大學，1985 ）頁 61-62 。

率高，土地既是地主個人財富的主要存在形態，同時也是他們財富增殖的主要源泉。土地所具貯藏價值與投機價值的雙重功能，使有錢人特別是軍閥官僚，都要搶購土地。加以中國傳統經濟土地商品化的特點，社會財富的形態最終多沈積於此。而農民又大量破產、土地價格低廉。這諸多因素就爲地主階級兼併土地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從而造就了大地主。陳翰笙說：「因爲中國經濟的情形不允許迅速的工業化。軍閥暴歛來財富，大都是放在土地上，拿地租做利息。於是大軍閥擁有大土地，東北數省大者數千頃，小軍閥有土地，也是數千畝數百畝。現在廣東的南部、雲南的迤南，江蘇的江北、綏遠，四川的全省，都是這樣的情形。」[102]

馬克斯主義論者主張變革地主經濟，推動農民革命，實施土地國有，第一層意義就在掃除附著於此的半封建及半殖民的勢力。首先，就掃除中國農村再生產過程的最高支配者 —— 帝國主義資本的勢力而言。孫冶方說，帝國主義財政資本統治殖民地的結果，一方面造成了農民手工業者的破產，致鄉村人口過剩，另一方面又阻止了本土民族工業的發展，於是，「都市中找不出路的失業者，都向土地上『擠壓』；在生產中找不到應用的資本，便轉向地產公債等投機事業活動」。如此，「一切舊的生產關係又繼續的再生產下去」。高額地租和零佃經濟，自然是這種土地生產關係的必然產物，同時亦就是此種土地生產關係得能如此根深蒂固的另一原因。[103] 錢俊瑞說，「中國整個農村……已在國際資本的支配之下，中國買辦性的資本對於農村生活的支配……一天天加強。」然而中國農村中資本主義的生產佔有相當存在的結果，土地所有還是佔有剩餘生產物的最主

102　陳翰笙《陳翰笙文集》，頁 130。陳氏又有一段文字說明土地集中的新浪潮，見氏著《解放前的地主與農民 —— 華南農村危機研究》，頁 8。他說，「由於封建主義關係之殘餘，新軍的指揮官們只不過是一伙軍閥，他們往往同時是地主和買辦。袁世凱是中國第一個最著名的代表。在他之後，像繁星不計其數的大小軍閥遍布各省。從這些軍閥中浮現出一種新式地主，這是由於他們通過稅收，從貸款中抽取佣金以及剋扣士兵的薪餉養肥了自己。這種新地主比那些屬於舊鄉紳的大地主勢力要大得多，因爲他們現在可以直接憑藉武力收取他們的地租，……。這種購置地產的活動無論何時何地都在進行中，……土地價值以及隨之而來的地租普遍趨於上漲。於是就掀起了一個土地集中的新浪潮。……農民破產的數量在不斷增長。」

103　孫冶方，〈財政資本的統治與前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關於中國社會性質及其革命性質的若干理論問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年），頁 67。因爲這些地主，無論是官僚或買辦階級，依據錢俊瑞的說法，都在外國資本的卵翼之下，「作爲帝國主義的附庸、作爲外國資本侵略中國的前衛」。見錢俊瑞，〈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與農業改造問題〉，《錢俊瑞選集》，頁 277-278。

要的基礎，而巨大的土地所有權則是農村統治的基礎。[104] 因此錢瑞端說：「帝國主義的資本已經掌有中國農村的完全支配權」，[105] 馬克斯主義論者主張土地國有，正是因爲帝國主義對中國農村的支配，持續推進了大地主的興起，並強化了地主經濟對現有資源的壟斷，應予剷除。

帝國主義的資本，取得中國農村的支配權，新興地主逐漸竄起，雖然顯示了中國農村中半殖民勢力的日益加強。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們又使中國農村中半封建的、而非資本制的剝削方式，取得優勢。錢俊瑞以爲，在新興的地主中間，他們絕對多數都是把耕地出租給一般農民耕種，根據其所擁有的土地所有權，收取農民的剩餘生產物；另外也有極少數的地主雇用長工和短工，進行規模較大的農業經營。中國農村中的富農，「本來是前進的資本制經營的代主」。他們常有較好的生產工具，雇用些長工和短工，從事商品性較高的生產，可是另一方面，中國的富農因爲國外農產品的競爭和國內市場的狹小和割裂，往往自己不願擴張生產。他們把土地出租，賺取較爲穩定的地租，或則兼營高利貸放，收取高度的商業利潤和利息。[106] 因此，吾人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地主和富農在農村中正用著半封建和資本制的剝削方式來剝削下層農民的剩餘生產物；而在這兩種剝削形式之中，在數量上無疑地是半封建方式占到優勢。

錢俊瑞因此以爲：「我們絕對不能說，資本主義經營是在維持落後的經濟型態；恰恰相反，它之要維持小農經營正是爲的要發展其自身的資本主義經營」。[107] 陳翰笙認爲外國資本家基於鞏固剝削基礎，只想盡可能地與地主買辦出身的軍閥官僚，形成聯合陣線，從而保持大土地的壟斷狀態的同時，也曾強調：「這種殖民地性質，實際上比其他任何因素更加有助於加強封建關係的韌性甚至強度」。[108] 這說明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經濟所建立的剝削統治，就作爲一種生產方式而言，並不能以純粹的形式孤立於中國自身的生產方式之外，是中國社會的生產關係，決定了帝國主義的剝削關係所具有的某種獨特之經濟體系的特徵。變革地主經濟，因此就具有掃除附從於該帝國主義殖民構造的封建經濟構造的使

---

104 錢俊瑞，〈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與農業改造問題〉，《錢俊瑞選集》，頁 295 。
105 錢俊瑞，〈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與農業改造問題〉，《錢俊瑞選集》，頁 284 。
106 錢俊瑞，〈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與農業改造問題〉，《錢俊瑞選集》，頁 279 。
107 同上註。
108 陳翰笙，《解放前的地主與農民——華南農村危機研究》，頁 87 。

命。因此依據漆琪生[109]的說法，「中國地主經濟乃一切封建關係之礎石」，且「中國封建勢力就是建築在這個礎石之上，所以，資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以中國地主爲有力的助手」。它不單是剝削佃農，而且榨取自耕農；不單是腐蝕農村，而且侵入都市。[110]土地國有制可以杜絕帝國主義殖民勢力的介入，也就消弭了附加其上的封建勢力。

由此可見，馬克斯主義論者何以主張推進土地國有制，以避免工農產品剪刀差價的日益擴大，並用爲消弭外國商業資本和官僚買辦商業資本的手段。依據孫冶方的說法，這是由於「中國的商場，主要地說，已成了買辦性市場」。外國商品到處充斥著城鄉市場。「外國商業資本和官僚買辦商業資本，通過向農民大量傾銷各種商品，他們從不等價交換中對農民的剝削，是日進年增的。」[111]換句話說，依據錢俊瑞的說法，改造農村的原義就在避免使中國農村透過買辦資本，更「間接直接地隸屬於列強資本的支配」，同時避免「中國農村中半封建的剝削以更尖銳的形式，起著更加酷烈的作用」。[112]凡此都在避免城鄉發展方向趨向背離的基礎上，消弭農工產品交換價格剪刀差的日益擴大。

馬克斯主義論者主張實施土地國有的第二層意義是希望根本消除土地所有與使用之間的矛盾。馬克斯主義論者主張以土地國有爲農村改造之最高指導原則，理由之二，係從剩餘生產物被榨取的形態此一關涉生產關係問題面向出發，強調高額的地租，可能意味著農民即將喪失其對生產工具或生產資源的控制能力，從而嚴重阻礙土地生產力的發揮。錢俊瑞認爲，三〇年代中國地租的本質，無疑已發展到了對「直接生產者剩餘價值的支配形態」。「它已攝取了（如果按照資本主義的範疇來說）地租和利潤的全部，甚至還包括著一部分工資」。所以，中國的佃農爲要維持農業的簡單再生產，就不得不將自己的生活程度縮減到生理必需的限度以下。[113]這自然談不到累積所得，更不用說改進農業生產。孫冶方因此認爲，土地價格和土地買賣本身，從生產的立場說，「非但不是必要的，而且是

109　漆琪生 (1904 ～)，原名相衡，號伯勳，四川江津人，日本京都帝國大學肄業，曾任湘鄂皖農村調查團團長，中山大學，廣西大學經濟系主任，著有《〈資本論〉大綱》、《中國農業問題特點及解決方策》等書，見徐友春《民國人物大辭典》，頁 1346。

110　漆琪生，〈從土地村有制說到中國一般的土地問題〉，《新中華雜誌》，卷 3 號 23，（ 1935 年），頁 30。

111　孫冶方，前引書，頁 112。

112　錢俊瑞，〈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與農業改造問題〉，《錢俊瑞選集》，頁 287。

113　錢俊瑞，〈中國地租的本質〉，《錢俊瑞選集》，頁 176-177。

有害的」。因爲「它徒然分去了很大一部分的資本，使生產方面反而感覺到生產不足的恐慌」。[114] 而土地國有，依據漆琪生的說法，它可使所有農民充分享受自己的生產成果，不被他人剝削，並且使一切農民皆有平均享受生產成果之可能，如此即可消弭農村中財富不平均的差異。[115] 換句話說，馬克斯主義論者既以爲生產力係由生產關係所決定，土地問題又必以現行土地所有與分配關係之解決爲前提，則在實施土地國有使土地所有與土地使用關係調整統一，剷除階級剝削之後，便同時解決了農業生產關係的問題。

在土地國有制之下，「全國直接生產的農民，皆能相應其勞動能力，圓滿的獲得農業生產之手段和機會，不受任何土地所有關係與生產條件所拘束」，於是目下貧農、中農因得不到足夠土地，以致不能有效發揮全部勞動力、並充分利用生產工具的現象，或得避免。[116] 然而在未邁入土地國有制之前，馬克斯主義論者顯然也認爲增加的貨幣可以緩和農村中的對立關係。漆淇生因此希望貨幣政策能疏通金融的緊縮，使農產品價格上升，農產品銷路增加，農民收入增多，農村經濟富裕，則「土地問題亦可不似從來之緊急而險厲，解決較易」。[117] 無疑的，對於非經過不可的過渡階段，馬克斯主義論者所關切者，爲貨幣經濟中因價格而形成的所得，對刺激社會財貨生產，從而由此影響社會財富分配上的作用。他們以爲貨幣改革可以緩和階級剝削及階級對立的現象。

八、結　語

中國馬克斯主義史學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高呼思潮解放的高潮鼓舞之下，眞正廣泛傳播於中國以來，一直以革命的史學自居。[118] 1927 年中國共產黨徒在革命失敗之後，從城市走入農村，認眞地展開馬克斯主義史學的調查研究，企圖解決革命的性質與道路問題。最後固然對革命的性質、任務、前途，有明確的論斷，然而對中國社會的性質仍然矇昧不明。於中國社會性質決定了革命的主要特點。

---

114 孫冶方，前引書，頁 85。
115 漆淇生，前引文，頁 31。
116 漆琪生，前引文，頁 31。
117 漆淇生，〈新貨幣政策與土地問題〉，《鄂大同》，轉引自《民國二十至三十年代中國經濟農業土地水利問題資料》（台北：成文出版社，1980 年），編號 68-C-4。
118 Arif Dirlik,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Chapter IV.

這種要求，直接反映到進步的思想界就構成了 1927 ～ 1937 年間三次論戰的內在革命要求和政治涵義，雖則表面上是以了解中國社會性質的思想論戰的眞面目，並以學術論戰的形式出現。所以馬克斯主義學者的功用雖則以解決中國研究是什麼性質的社會出發，然其最終目的仍在明確中國革命的目標、政策和方向。[119]

儘管直到一九五〇年代，中國馬克斯主義論者有關中國歷史的詮釋，仍希望朝多元而客觀的方向邁進。然而，馬克斯主義史學有關中國社會性質的解釋在三〇年代幾次論戰之後，幾已定於一尊。[120] 本文有關中國經濟恐慌的觀察，事實上是建立在有關中國社會性質的方法論及史觀等諸方面已達共識的基礎之上，因此解救經濟恐慌的最後歸趨，不可避免的強化了（土地）革命的必然性。本文文中引述的各個理論人物，從 1929 年起即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支堅強理論隊伍的成員，他們爲中共中央的政策進行辯護，是中國馬克斯史學理論主流派的代表人物。[121] 相對於馬克斯主流派對有關中國經濟恐慌的觀察及救濟之道，非馬克

119　韓明漢，《中國社會學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頁 47；頁 61-62；第六章。

120　Arif Dirlik, *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p.256-258.

121　首先對中國共產黨革命的道路形成和形式持懷疑態度，挑起對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爭議的是共產黨內部的以陳獨秀爲首的托洛茨基取消派。1927 年革命失敗後，他們認爲中國資產階級對於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已經取得了勝利，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結，中國無產階級只有待到將來再去舉行社會主義革命，在當時就只能進行所謂以“國民議會”爲中心口號的合法運動，而取消革命運動。因此被稱爲“托陳取消派”。其次，還有以陶希聖爲代表的“新生命”派。由於他與周佛海在上海辦《新生命》刊物而得名。他們主張中國當時是“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封建社會”。但他所謂的“帝國主義”不是指的壟斷資本主義，而是指明朝以來和中國通商的外國商人；而“封建社會”是不存在著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敵對矛盾，“封建勢力”卻指的是“以政治力量執行土地所有權並保障其身份的信仰的士大夫階級”，“而士大夫階級與地主並非一物”。爲了批判托陳取消派以及新生命派等人在革命道路的言論，一些持馬克斯主義觀點的學者以“新思潮社”的名義，出版《新思潮》雜誌，1930 年 5 月在該雜誌上發表了《中國經濟研究專號》。在這些具有代表意義的作品中，他們率先提出中國社會爲“半殖民地性與半封建性的社會”的論點。對新思潮派論點提出針鋒相對批評的，首推“動力派”。由於他們的文章主要登載在 1930 年創刊的《動力》雜誌上，所以當時人們稱他們爲“動力派”。“動力派”持“中國社會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論點，是前述托陳取消派的翻版和繼續。參加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的，大致可以分成兩個陣營。一個是以當時的《中國經濟》雜誌爲基礎；另一個以“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主辦的《中國農村》雜誌爲基礎。《中國農村》揭露、批判托派所謂中國社會已是資本主義社會，用大量的農村調查的具體材料，證實中國農村社會性質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有力地打擊了托派對黨的誣衊，是研究會和刊物的主要成就之一。可見中共內部或馬克斯學者之間，派系對立，對中國社會性質見解不一。參考 Arif Dirlik, *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chapter 4, 5, 6；韓明漢，《中國社會學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第六章。

斯主義論者的自由經濟派學者，因爲不相信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是中國經濟恐慌發生的根本原因，所以反對將抵制農產品傾銷、抵制通貨戰爭、抵制外資視爲救濟經濟恐慌的權宜手段，更不認爲土地國有，以及反帝國主義及其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是解放經濟恐慌的最後手段。這可以由馬克斯主義論者對自由經濟派學者救濟經濟恐慌言論的批評得知。持貨幣論的自由經濟派學者主張貨幣改革，貶低銀幣價值，增加貨幣供給，平衡物價。中國馬克斯主義論者則對貨幣論的經濟危機說，提出批評。他們以爲貨幣和放款資本的缺乏，並非經濟危機形成的原因，而是經濟危機的結果，是資本主義生產結構發生基本矛盾後的表徵，且只有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才會發生。[122] 另有些自由經濟論學者主張促進出口貿易，限制入口，從刺激生產，再進而刺激消費，以繁榮經濟。[123] 馬克斯主義論者也反對此生產與消費失調的經濟危機說。他們認爲經濟危機的發生不是源自生產的失調，也不是民衆消費的不足。他們認爲民衆消費不足是任何建立於剝削行爲之上的社會制度之必要前提，也是資本主義社會形成的必要前提。所以，群衆消費不足只是經濟危機形成的條件之一，但並不是經濟危機發生的眞正原因。[124] 馬克斯主義論者強調經濟危機的形成乃根源於生產方法的特殊矛盾，即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不和諧。這就製造了生產的社會性與私人的占有性之間的矛盾。由於在生產關係矛盾之展現上，對帝國主義之民族衝突和對封建勢力的階級衝突兩項任務的配合與相互關係密不可分，所以馬克思主義論者會確認中國革命的性質是反帝國主義及其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並以土地國有之革命爲達成手段。

---

122 張仲寔以爲，在資本主義社會裡的經濟危機時期，之所以感覺需要貨幣和放款，並不是因爲一般貨幣太少，「而是因爲經濟危機時期所顯露的生產過剩，迫使一切資本家『保守』現款，『驅逐』貨品之故」。所以貨幣和放款的減少，是產生經濟危機的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發生了基本矛盾的表現。見張仲寔，〈資本主義底經濟危機論〉，《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1934年冬季號，頁572。

123 崔曉岑將當時自由經濟派人士有關恐慌救濟的言論分爲兩派，一派主張從貿易上著手，其具體主張包括提倡國貨、提高關稅率、徵收匯兌傾銷稅、實行輸入限額制、補助輸出業、減免出口稅、與各國協商以貨易貨等。另一派主張從改革幣制著手，其具體主張包括舉借外債、改金本位、禁銀出口、貶低銀幣價值等。見崔曉岑，〈四十年來之中國幣制問題〉，《經濟學季刊》，卷6期4（1936年1月），頁23-24。

124 如王昆崙即指出，消費生產間的不均衡，並未說明現在爲什麼會發生經濟危機，以及以前爲什麼沒有發生。因爲，「群眾消費之不足，在資本主義前期也是有的」，且此種事實，「業已存在了好幾千年，在任何分成的社會中都是可以看到的」。見王昆崙，〈世界經濟恐慌與中國殖民地化的現狀〉，《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1934年冬季號，頁601。

一九三〇年代中國的馬克斯主義論者並不認爲經濟危機是景氣循環固定的週期性現象，或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運行不可或缺的動態要素。相反的，他們認爲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即將衰頹或終將崩潰瓦解的徵兆。他們認識到了在經濟危機擴展的過程中，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工業危機不只是與各農業國家的農業危機同發生，而且與之錯綜結合在一起。他們並且發現，這次危機不僅是在生產範圍和商業範圍洶湧流行起來，同時蔓延於信貸和金融範圍，終至完全推翻了各國間原有的信貸關係和金融關係。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中國的馬克斯主義論者呈現的中國經濟恐慌史，一如其他論述所表現者，性質亦近乎是一個普遍歷史過程的表現，卻較少表現中國歷史發展過程的複雜性與獨特性。[125] 他們進一步論述說，危機在經濟領域內普遍化傾向的增強，進一步顯示中國一如其他部分的世界經濟，已然進入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即〈帝國主義〉或〈資本帝國主義〉時代。中國的馬克斯論者，意識到它具有如下的特徵(1)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已經融合起，在"金融資本"的基礎上形成了金融寡頭，從而威脅了中國的經濟秩序；(2)與商品輸出不同的資本輸出有了特別重要的意義。[126] 這可以說明貨幣金融方面的救濟手段，何以一如世界其他各國的馬克斯主義論者，同時也特別受到三〇年代中國馬克斯主義論者的注意。

Shanin 以爲有關馬克斯主義的研究法可分兩種型態，一是階級分析法，一是體系分析法。[127] 或許因爲有關中國經濟恐慌觀察的現象是個可以探究的具體而動態個案，而不是純粹中國社會性質的靜態反映。馬克斯主義論者有關中國經濟恐慌的觀察，除了慣有的階級分析之外，略帶若干體系分析色彩。儘管三〇年代中國的馬克斯主義論者相信列寧所謂「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的名言，[128] 然而他們顯然明白，帝國主義絕不如列寧所言，只是資本主義發展

---

125 Arif Dirlik, *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p.247-248.

126 Tom Bottomore, *Theories of Modern Capitalism*；張維安譯，《現代資本主義理論》（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89），第五章。

127 T. Shanin, "The Third Stage: Marxist Social Theory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6, No.3. (1976), pp.305.

128 Tom Bottomore, *Theories of Modern Capitalism*；張維安譯，《現代資本主義理論》（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89），第五章。

的一個階段，它也是兩個以上的國家或經濟體系之間的關係。資本主義的特徵——社會矛盾——因此也是國際性的。換言之，這種矛盾並不是一國之內階級與階級之間的矛盾與對立，它也發生在世界上的帝國主義國家與（半）殖民地國家之間。因爲他們認爲「殖民地係內含於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之中而爲資產階級的一個特殊的壓榨對象」。[129] 儘管階級的關係常被國家或民族的關係所隱蔽，然而（半）殖民地與資產主義國家相對立所構成的剝削關係，實際上也延伸至國內，使中國這樣的半殖民地的無產階級化有更廣泛和深化的發展。固然，殖民分析補充了低度發展國家內階級結構中不清晰的面向，然而正是這種階級結構爲核心的分析，使資本主義體系成爲展現雙重歷史發展過程的複雜結合的分析體系。此雙重體系，其一是發生在國際關係層次上，其一是發生在國家社會之內。資本主義分析體系因此是包含綜合「外部因素」與「內部因素」的分析體系。因此，中國馬克斯論者有關中國經濟恐慌的分析取徑，似乎展現了體系分析的特質。

進一步言之，馬克斯主義論者以土地關係爲基礎的階級分析法應是不成立的。馬克斯主義論者以土地關係論此一階級分析法解釋經濟危機發生之根源，他們把中國持續的經濟蕭條歸因於土地耕種者的收入和各種土地的非生產性支出，被各種剝削者吸收，這些人靠農村盈餘過活，卻毫無貢獻。中國馬克斯主義論者強調相抗的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兩造之間的所得有趨於兩極化的發展趨勢。[130] 然而依據某些非馬克斯主義史家的研究，1949 年以前中國農村中農民、地主與政府商人之間再分配的效應，對農民普遍而言不是那麼繁重的。儘管中國農村不平均的土地所有權、租佃、農村債務、不公平的稅收，對中國的經濟蕭條和農村日益貧困發生了一定的作用。土地的使用權缺乏保證，高地租和地主與佃戶之間的關係，對進行純農業投資既缺乏刺激又缺乏財力。[131] 然而並沒有任何有用的定

---

129 王德昭，言引文，頁 224。

130 Carl Riskin, 'Surplus and stagnation in modern China', in Dwight H.Perkins, ed., *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131 Robert Ash, *Land Tenure in Pre-revolutionary China: Kiangsu Province in the 1920s and 1930s.* (London: Contemporary China Institut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76), p.50.

量資料可用以估計農村盈餘的確切用途，是否流入地主的手中，從事消耗性或奢侈品的消費，或是購買土地，以致助長了中國農村中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132] 很多學者認爲農村增長受到抑制須歸因於不適當的投入，特別是技術改進，而非制度的僵化。他們認爲土地所有與使用、農村高利貸是自然出現的問題，這種制度衍生出的關係在產量上的效應對整個經濟趨向是衰減的。在 1937 年以前，總農業經濟成長仍有值得讚揚之處。[133] 總言之，馬克斯主義論者以土地關係爲核心的階級分析取徑研究三〇年代中國社會之發展，有其局限。

132 還有一個關於農村創業的"盈餘"部分的問題，它潛在地可以用作生產投資。維克托・利皮特把農村盈餘等同於土地所有者得到的財產收入（主要是地租）加上自耕農所納的稅，在他之後，卡爾・里斯金發現，1933 農村實際總盈餘等與國內淨產值的 19%。（假定實際總盈餘爲國內淨產值的 27.2%，他估計非農業部門創造的盈餘佔國內淨產直的 8.2%）。扣除投資、公共服務和可歸入農村盈餘的政府消費部分後（1933 年這些用途佔總數爲國內淨產值的 5.8% 中的 4%），再假定 15% 的國內淨產值被農村中有權勢的人物用於奢侈消費。見 Carl Riskin, 'Surplus and Stagnation in Modern China', in Dwight H.Perkins, ed., *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57 ; Lippit, Victor D., *Land Refor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White Plains, N. Y.: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1974), p.36-94.

133 Myers, Ramon H., *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 1890-1949.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該書各章皆有此種論點。